

明防倭重镇海州

从明朝建立之始,中国沿海一带就经常受到倭寇的侵扰,而当历史发展到明中叶时,倭寇对中国东南沿海的侵略则成了明朝的一大忧患。美国学者黄仁宇对此很不理解,他在《万历十五年》一书中写道:“在十六世纪中叶,日本这一个岛国能够严重威胁本朝东南沿海各省的安全,这种现象是很难理解的。合乎逻辑的倒是本朝的士兵应该越海进攻日本。”

这种奇特的历史现象的发生有其深层次的政治、经济背景。谢承仁先生在《戚继光》一书中说:“从十四世纪末开始,明朝和东方邻国日本的封建经济都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就刺激了两国贸易的扩大。当时双方的贸易主要采取日本人贡及明政府赏赐的方式在两国政府之间进行。为了防止走私和骚扰,明政府对两国之间的贸易作了严格的限制,贡期、船数及人数都有规定,贡船还必须由明政府颁给日本政府的勘合(贸易执照),并且不得携带武器。”但到正德、嘉靖年间,勘合条约已经限制不了日方的行为了。

日本在一三三三年以后,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到一三九二年北朝的足利氏征服了南朝,因内战失败而丧失军职的南朝武士流亡在海岛上,成为无业的浪人。他们勾结九州一带的不法商人,还利用一部分破产农民,合伙坐船到明朝沿海地区来,时而进行走私,时而进行抢劫。这是明朝初年的倭寇来源。十五世纪后期,足利氏政权名存实亡,日本进入新的群雄割据时代——战国时代,兼并战争不断发生。各地的封建藩侯和寺社(寺院大地主)为

了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解决国内战争带来的财政困难,并满足自己的贪欲,他们根本不愿意受明日两国政府间正常贸易渠道——勘合条约的约束,而是采取非法的海盗行径,支持并且组织自己境内的浪人和商人渡海到中国来掠夺物资和财富。甚至其政府来明的贡船也假入贡之名进行海盗活动,这样,倭寇就比明初大大地猖獗起来。在明朝方面,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的明朝统治的危机,到武宗正德、世宗嘉靖年间发展到十分严峻的程度,给倭寇大举入侵造成了便利条件。

倭寇的侵略给东南沿海人民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失,关于这方面情况真是史不绝书。由于明朝当时集中力量防备北方的俺答,沿海武备废弛,有时几个人一小队的倭寇就可以长驱几百里,杀人放火,无人能抗。就江苏而言,从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开始,倭寇前后作乱长达三十年之久。在这期间,倭寇一次打到南京,两次占领淮安。嘉靖二十四年(一五四五年),倭寇掠苏,劫芜湖、太平,直犯南京。三十七年(一五五八年)五月,倭寇侵犯扬州、天长、盱眙、泗州,一直打到淮安。三十八年(一五五八年)四月,倭寇入通州,再犯淮安,据庙湾(今阜宁)。所到之处,奸淫掳掠,无恶不作,人民苦不堪言。

二

考之海州史志,只发现有小规模倭寇入侵,没有深入腹地数百里的记载。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最主要的原因是海州作为一座军事重镇,令倭寇望而生畏,不敢轻易涉足此地。海州地处中国脐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隆庆海州志》论其形势曰:“东滨海道,西接徐邳,北控齐鲁,南蔽江淮。沧海渺弥,茫无际汇。高丽、百济、日本诸国直其东,风帆之便,不测可至。”《康熙海州志》又论曰:“海州南通江浙,北达登莱,古来用武之地。”这样一处战略要地,明朝政府从一开始就十分注意经营,建立起了一座海防重镇,有效地阻止着倭寇取道海州对广大中原腹地进行侵扰。

海州作为防倭军事重镇首先表现在军事防御体系的严密方面。据清初海州知州刘兆龙《东西守御二所并屯田纪略》一文记载：“东西二所之设，盖缘本州郡城逼处海边，东海孤悬海上，地当要冲。前朝洪武年，倭警与海寇交讐，故于淮安卫八所之内一分中所守御海东，一分中前所守御海西。东所有南北二城十四墩，明朝奉行增筑四墩，共一十八墩，西所有州治、仓库，十三墩，又奉行该有司增筑三墩，共一十六墩。皆分派军丁操防城池，了望墩台，从不领运。”说明明朝甫建，便为防倭事，在海州设立了守御东海千户所和守御海州中前千户所。两所官军专司防倭军事，免其领运。

二所驻地规格较高，建筑规模与州治相当。据《隆庆海州志》记载：“守御海州中前千户所，在州治北。洪武二十三年创建。正厅三间，抱厦三间，后堂三间，穿堂一间，左右厢房各三间，东西司房各五间，镇抚厅三间，库房三间，监房三间，仪门三间。”可见规模不小。又有军器局（兵工厂）“在千户所西。弘治六年，千户王铠创建。正厅三间，东西造作房各五间，门屋三间。”还有军器库十二处，用以储存武器。为了训练士卒，西海所又建教场一所、演武亭三间，另有耳房一间、厨房一间。守御海州中前千户所（西海所）不但负责海州州城的军事防御，而且是军火制造的后勤保障基地。

守御东海千户所的规格与西海所相同，《隆庆海州志》载谓：“在东海城十字街东。洪武十七年，千户黄寿创置。正厅三间，抱厦三间，后堂三间，穿堂三间，左右厢房各一间，东西司房各五间，镇抚厅三间，库房三间，监房三间，仪门三间。”与西海所房间数量相等，不同之处在于东海所左右厢房少了两间，而西海所的穿堂少了两间。

由于东海所防守的是东海岛（后称云台山，清康熙年间与陆地相连），方圆三百余里，大小一百三十六个山头，地域广阔，故东海所在岛中建立起了一系列营寨，构筑起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它们是墟沟营寨、宿城营寨、东海营寨和西石岛水师营寨。据《隆庆海

州志》记载：“墟沟营寨，洪武二十六年，守御千户杨从益开创，正厅三间，后堂三间，左右耳房各一间，东西司房各三间。”除了这些设施，墟沟营寨尚有教场一所，演武亭三间。“宿城营寨，洪武二十六年，守御千户杨从益创建。正厅三间，后堂三间，仪门一间。”此营亦有教场一所，演武亭三间。

东海营寨情况《嘉庆海州直隶州志》有载：“《陈志》有二寨，洪武二十六年守御千户杨从益设，去东海城东北八十里。”表明此处有两座营寨，可见明军对东海城侧翼安全的重视。西石岛水师营寨的位置就在今天的西墅，山海形势险要。《隆庆海州志》对其咽喉地位有详细的描述：“东海西石岛，去东海城八十里，山高险，南、西、北三面环海，东接舍利山。凡舟往来，舣以伺风信，控制海道，实为要地。洪武六年，淮安卫委官统兵泊舟于此守备。今弓兵把守了望。”从这段记载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此处水师营寨的重要性。明朝初年由水师防守，到嘉靖年间，改为弓兵防守。弓兵属巡检司，明初天下冲要之地皆设巡检司，于丁粮相应人户内点弓兵应役，一年更替。

从上述史料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海州的海防体系非常严密，东海岛（云台山）上的守御东海千户所共有六座城寨，十八墩。墩台上的士兵日夜了望，一发现警报，就会举火升烟为号，六座城堡中的士兵就会严阵以待。整个东海岛（云台山）势同一座海上堡垒。如此一来，就形成西部大陆上的海州州城的一道天然屏障。海州州城又有西海所镇守，沿海十六墩，与东海所形成隔海夹击之势。这样的防御体系，确实令倭寇无缝可觅，发动不了大规模的骚扰。

其次表现在防御城堡的坚固方面。州城城池的坚固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而是经过从洪武到万历漫长的近二百年多少代海州军民的不懈努力才完成的。据《隆庆海州志》记载：“旧志有东西二城，东城高二丈七尺，周围三里，有东西二门。并西城，元季兵废。

国朝洪武二十三年,淮安卫分中前千户所,千户魏玉守御,因西城故址修筑土城。永乐十六年,千户殷轼砌以砖石,高二丈五尺,周围九里一百三十步。东、西、南、北四门,东曰镇海、西曰通淮、南曰胸阳、北曰临洪。月城二。西设水关,池深六尺,吊桥三座在东、西、北门外。嘉靖间,知州吴必学复因城埤增拓,环以铺舍,翼以栅门。署印通判范永官、李维东,知州钱腾蛟、高瑶、杨本俊,相继修葺,工未就续。隆庆壬申,知州郑复亨修筑沿西一带始为完城,民可恃以固守矣。’可知海州州城从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〇年)开始起筑,直到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年)才修建成了一座完整的坚固城池,历时一百八十二年。海州城的修筑历史,反映了海州军民挫敌于坚城之下的顽强意志,故《康熙海州志》赞曰:‘前朝倭奴犯境,西所捍御之绩匪浅。’诚哉是论。

东海岛(云台山)上的东海城的坚固程度一点也不让州城,《隆庆海州志》载谓:‘东海城,旧有大小二城,宋宝祐中,贾似道献捷筑。西、南二面控海,东、北二面抵山,实为重镇。恃此以胜北虏。大城连接小城,东、南二面,通为一城。周围一十三里,皆砌以石。有东、南、北三门。洪武元年,调官军镇守。永乐十六年,淮安卫指挥周得辛增高二尺五寸,并女墙高二丈二尺五寸。城镇二十五座。又有东南水关。东、西二门以北因山为险。吊桥三座,在东、南、北门外。’真不愧是一座险要的海防名城,张峰在《隆庆海州志》中论曰:‘东海城跨山临海,与州城声势相援。古人建置,必真见要害之所在而为之。’极言此城的重要地位。从记载来看,东海城极为坚固。

东海城又称南城,与墟沟营寨的北城遥相呼应,前文所引刘兆龙所言‘东所有南北二城’,即指此。

北城的建筑情况记录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墟沟营寨,《陈志》旧垒并女墙五十七座,高一丈四尺,面七尺,脚广一丈八尺,周围三里九十步,东、南、西、北四门。永乐十六年,指挥周得辛增

加三尺。’可知北城是一座规模较小但非常坚固的海岸要塞。东海营寨的两座城堡及西石岛水师营寨的建造之情不见记载，可以想见，必是与北城、宿城差不多的坚固壁垒。

海州地区构筑的坚固城堡群，使海州人民获得了相对安全的生存空间，有力地遏制着倭寇的侵略野心。

从孙子到毛泽东，我国军事家一贯强调人在战争中的作用，认为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明代海州之作为军事重镇，离不开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畏强暴、英勇敢战的人民。

关于海州人民的性格，较早时期的《隋书·地理志》就说：“考其旧俗，人颇劲悍轻剽，其士子则任气节，好尚宾游，此盖楚之风焉。”明代的《淮安府志》亦曰：“民俗勇悍，不畏强御，惜名节，保身家。”充分说明海州人民具有不畏强暴、敢于斗争的精神品质。

在明代抗倭斗争中，海州军民同仇敌忾，英勇杀敌，夺取了辉煌胜利。陈宣《海州志》载曰：“嘉靖三十六年五月，倭寇突至新疃，州所兵斩获数级，余遁去。至清河口，州判王柱、千户吴继勋等剿杀之。”《赣榆县志》亦曰：“嘉靖三十四年，倭由夹仓山登岸，掠县东鄙，海州同知章道明、县丞林松率民兵御之。”《淮安府志》载：“嘉靖三十四年，倭贼三十六人自海州流入境（沭阳——笔者注），遇邳州兵而歼。”这三次发生在海州、赣榆、沭阳的抗倭斗争都以海州军民的彻底胜利而告结束。

在抵御倭寇、保卫乡土的战斗中，海州百姓奋勇迎敌，不少人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其中最典型的要数三义、六勇。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周淇，字海濒，海州人，有胆略，善骑射，以细瓷末实甲。万历间，有倭警，州牧征淇御之，有功。后与乡饮宾，以寿终。州人祀于东陲山之西滩，名三义祠。”陈宣《海州志》载：“陈升，海州人。征倭，率其徒五人，力战，没于阵。通判范永官祀于东陲山，曰六勇庙。”他们为抵御倭奴的侵犯，不怕牺牲，一往无前，是

海州人民英雄主义精神的生动体现。

海州人民中间既有不怕死的,又有不爱钱的,如捐金筑城的进士张朝瑞和僧人无相禅师。张朝瑞的事迹收录在《嘉庆海州直隶州志》中:“张朝瑞,字子祯,海州人。隆庆时,州有倭警,筑城,朝瑞请于父,率钱以助之。”与张朝瑞同时代的裴天祐在《重修海州城记》中载曰:“进士张君朝瑞捐修坊四十金,为有力之家倡。”可见他为抗倭捐出一笔很大的款子。云台山开山祖师无相禅师捐资筑城事迹有当时人顾乾的《无相上人传》记载:“甚至防倭之城,通津之渡,罔不相而修之。”吴铁秋《苍梧片影》也说:“东海防倭的城,塔湾通津的渡,他都蠲资重葺。”称得上是一位爱国僧人。

海州官军除在本土作战外,还曾去苏州支援抗倭斗争,并有一个百户牺牲在那里。据《隆庆海州志》曰:“丁澄,西海所百户。少孤,事母以孝,闻母疾,澄割肱疗之,母愈,人以为孝感,知州王公旌其孝行。至苏州府,平倭阵亡,挽章有‘割肱昔时终孝养,捐躯今日尽忠良’之句。”这些史实无不反映出海州军民的英勇和顽强。

面对这样的军民,倭寇的气焰是无论如何也嚣张不起来的,他们一踏上这块土地,就会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遭到最后灭亡的下场。因而这些海上强盗不把海州作为他们劫掠财富的目标,而跑到浙江、福建沿海一带大逞凶焰,最终还是在中国人民面前碰了个头破血流。

(《海州湾纵横》二〇〇二年试刊号)

从备倭指挥到东海把总

明朝建立之初,为防倭寇侵扰,从淮安卫八所中分出两个千户所驻守海州地区,一个是守御海州中前千户所,一个是守御东海千户所,并在两所之上设备倭守御东西二海指挥僉事,由淮安卫指挥一员担任。该员是东西二海千户所的上级指挥官,但海州志书中却没有记载历任备倭指挥的姓名、简历,很可能是因为备倭指挥驻地不在云梯关,不属海州辖地,故海州志中不收。

目前从《隆庆海州志》中发现的备倭指挥只有张瀛、张柱父子二人。张瀛在对付刘六、刘七农民起义军的战斗中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升淮安卫指挥僉事,备倭东西二海。他的儿子张柱出于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正德十六年(一五二一年)在海州城内创立守备公署,驻节于此,便于指挥协调二所动作,防止倭寇入侵。此署在《隆庆海州志》中记载已废,而“至天启年间,又改为苏公祠。”《康熙海州志》说明在张柱之后,备倭指挥仍驻云梯关。

嘉靖三十三(一五五四年),明政府将备倭指挥从云梯关移驻东海城内,称东海把总。设置东海把总的原因是“关内作乱”,故“将云梯关把总一员移于东海城中。”《康熙海州志》。兵变只是诱因,不发生这场兵变,东海把总也还要设,因为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正处在倭寇猖獗的时期,在防倭第一线的东海城中设东海把总,是防倭的客观需要。

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丰臣秀吉进攻朝鲜,明朝派军队入朝参战,爆发了一场震惊世界的抗倭援朝战争。在这场打了七年的战争中,海州北抗齐鲁、南蔽江淮的战略地位显得尤为重要,明

政府在此加强了兵力。据《嘉庆海州直隶州志》记载：“万历二十年倭犯朝鲜，增设水陆三营驻东海。”《康熙海州志》对这水陆三营记载尤详：“募兵一千五百名，分水陆三营，各设名色把总一员分领，五百名屯本城（指东海城——笔者注），五百名屯鹰游山，又五百名屯荻水口。各有官造沙唬船只，专备东倭，兼防海盗。”这一千五百名“专备东倭”的精兵非卫所兵可比，他们装备精良，各营均配备了官造沙唬船。沙唬船就是沙船，在我国航海史上写下过辉煌篇章，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就是大型沙船。在海州布置这种战船，说明当时明军十分注意海州沿海的守卫，防止倭寇从海州登陆包抄明军后路。

东海把总一职在明朝灭亡的前一年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改为守备，恢复了原来备倭守御东西二海指挥僉事的旧称。从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至崇祯十六年（一六四三年）将近百年的时间里，共有十七任东海把总（《康熙海州志》和《嘉庆海州直隶州志》均有记载），他们在巩固海州地区的防倭军事力量，保卫海州人民和平生活方面均有建树。

东海把总之设，改变了“先是把总住云梯关，遥辖东西二所”（《康熙海州志》）的局面，增强了海州这个防倭军事重镇的指挥作战能力，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连云港论坛》二〇〇二年第一期）

明代海州城的修筑经过

海州历史悠久,其城垣亦经历长时间的修建,而以明代修筑尤力。《隆庆海州志》载谓:“州城旧有土城,相传梁天监十一年马仙埤筑。宋绍兴二十二年,魏胜复筑城浚隍以备金人;宝祐三年,李坛又加修筑。”可见海州城的修建可追溯到距今一千四百五十年的梁天监十一年(五一二年)。宋时海州城“有东西二城,东城高二丈七尺,周围三里,有东西二城,并西城。”(《隆庆海州志》)元季海州城毁于兵火。明朝建立后,对海州城进行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修建。

一、明初之筑城

有明一代,海州城经过多次修建。张传藻先生认为“从海防看,修海州城有防倭寇的意图。”(《东海地名的演变》)这个观点符合历史实际,古代城池的修筑有着明显的军事目的,使人民在内外战争中受到有效的保护。明代之修筑海州城,则主要是为了防倭,这一点在明初就确定下来。

据《隆庆海州志》记载:“国朝洪武二十三年,淮安卫分中前千户所千户魏玉等守御,因西城故址修筑土城。永乐十六年,千户殷轼砌以砖石,高二丈五尺,周围九里一百三十步。东、西、南、北四门:东曰镇海、西曰通淮、南曰胸阳、北曰临洪。月城二。西设水关,池深六尺,吊桥三座,在东、西、北门外。”表明洪武二十三年(一三九〇年),出于防倭军事需要,明朝政府于淮安卫中分出中前千户所守御海州,千户魏玉在宋代海州西城故址重修州城。当时修建的是土城,与前代并无二致,但规模为大。到永乐十六年(一四

一八年)海州城在千户殷弼的主持下修成砖石城墙“始屹然矣。”(裴天祐《重修海州城记》)从明初开始修建土城,到永乐年间建成砖城,都是千户所军方主持进行的,防倭目的甚为明确。

二、嘉靖间之筑城

永乐以后,海州城在弘治五年(一四九二年)由知州陈廷珪增修了西城墙(王洪金编《连云港市城市建设大事记》),便未经大的修筑。到得嘉靖年间,已是断垣残壁,破败不堪。时人裴天祐见到的城墙情况是“嘉靖壬子春,余承乏建安道出兹郡,见是城也,垣圯池湮,径窦交穿,人或履之出之。”(《重修海州城记》)可见嘉靖三十一年(一五五二年)海州城墙已倾塌大半,护城河也已淤塞,城墙废址上面道路穿插,群众越墙出城如履平地。而此期正是倭寇侵扰东南沿海最剧时期,海州城墙的这种状况,当然不足以抵御倭寇,故发生“嘉靖间,倭夷入寇城中,士女皆出走”(张朝瑞《海州新城记》)的事情也就不足为奇了。

嘉靖三十三年(一五五四年),吴必学知海州事,海防形势相当严峻,倭寇侵扰吴、越、江、淮骚动。吴必学“刺海之愈月,大惧城恶,谋新之。”(《海州新城记》)他说“匪城曷郡 匪郡曷民 彻桑未雨之图,犹不可后,矧警焉日闻乎?”(《重修海州城记》)认为在当前倭寇猖狂的情况下,没有城墙就没有海州,也就没有海州人民。吴必学向海州军民宣布他的筑城大计“利用砖石则易崩,利用灰泥则易败。成大事者,不惜小费 怀远虑者,不急近功。吾将以一劳永逸者遗之民也。”(《海州新城记》)他要将海州城建设成为一座永久性的防倭城堡,让这座城堡作为他献给海州人民的一份厚礼。于是吴知州“乃计费度工,藉财于官府,取力于隙民,凿山运石,满墟完啮。”(《重修海州城记》)开始了海州城的重修计划。工程进展顺利,据《隆庆海州志》记载“因城埤增拓,环以铺舍,翼以栅门。”然而,天不遂人愿,吴必学不久便以丁忧去职,难以完成其宏伟计划。

继任王宾于嘉靖三十五年(一五五六年)到任,继续海州城的修建。王知州改变了吴必学由地方包办的做法,“谓州所共城,工役讵可偏累,因调停焉。民缮其七,军缮其三。”(《重修海州城记》)将原来全部由地方负责的修城工程三七开,地方负责七,军方负责三,减轻了地方压力,有助于工程的顺利进行。其后两任知州杨本俊、周世臣“次第修之,皆未就。”(《重修海州城记》)李维东主政海州后,“广区画,躬慰劳,明激劝,刻程责绪,兼举并兴。进士张君朝瑞捐修坊四十金,为有力之家倡。由是东、南、北三面,东南、东北二隅工先告完第十七。”(《重修海州城记》)经过王宾、杨本俊、周世臣、李维东四任州官的努力,海州地方负责的十分之七的工程宣告完成。而军方负责的十分之三的工程因为“所无储积,而军之力弱且单”(《重修海州城记》)的原因没有完成。

从吴必学筑城开始,“工之因循几二十年矣,未有成之者。”(《海州新城记》)

三、隆庆间之筑城

隆庆五年(一五七一年),郑复亨知海州,甫到任,海州父老就向他反映城墙不完的情况。郑复亨慨然说道:“书警亏篑,诗戒弃劳。是城也未完十三,及今修焉,费省而功倍。不然,前劳不尽弃乎?”(《重修海州城记》)

有人扯皮,认为工程未完责任在军方,对此,郑复亨很不以为然。他说:“嘻,军疲矣。以统驭计,军民异分;以利害计,军民一体。息民而罔恤其军,息军而罔恤其民。均之谓僻,是责在我。”(《重修海州城记》)明确表示,在筑城防倭这个问题上面,军民的利益是一致的,军方既然财力枯竭,那么就由他来协调资金,继续筑城。

郑复亨率先垂范,捐出自己八十余金俸禄,然后向台院、道府申请公帑,又让百姓自愿出工,命赵绍恩总管工程各项事宜。“故人心感悦,率作忘劳。西城一面,西南、西北二隅,倾者植,缺者补,

圯于积雨者，重培碇石，覆甃增卑附薄。『《重修海州城记》』工程从隆庆六年（一五七二年）二月开始，到年底结束，共用了十个月的时间。建成的海州城墙‘砖厚四尺许，土厚一丈五尺许，共厚可一丈九尺。大约上八分为砖，下二分为方石，石取其奠基也。』《海州新城记》建成的海州城‘周环九里有奇，高一丈九尺，广一丈九尺，雉堞门序，云连鳞次，言言翼翼，可以待暴纓民矣。』《重修海州城记》西海所真正成为一座坚固的防御城堡，当初吴必学的修城思路终于变成了现实。

四、晚明之筑城

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年），丰臣秀吉的倭军进攻朝鲜，明廷为唇亡齿寒故，毅然发兵入朝，打击这股明朝历史上最大的倭寇。海州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明廷不但把东海把总移驻东海城，而且增设水陆三营驻扎东海（今云台山）。与东海隔海相望的海州城亦积极备战；知州周燧将西南二门铺筑月城，仍周围筑敌台九座，四隅角楼四座，以便守御。『陈宣《海州志》』在城墙上面增筑了敌台、角楼等工事，还在西南二门增筑了月城。

万历四十年（一六一〇年）；‘恒雨，城墙圯三之一，知州杨凤补葺完固。』《康熙海州志》天启二年（一六二二年）；‘邹滕妖人弄兵，知州刘梦松虑沿西一带城障难守，首捐俸率钱，加增各三尺，共五百余丈。东门距西门二里一百九十步，南门距北门二里一百一十九步，屹然巩固。』陈宣《海州志》邹滕妖人指山东白莲教首领徐鸿儒，他在郛城、邹县、滕县的战斗，大大危及海州的安全，因而知州刘梦松对州城沿西一带进行加固，防备白莲教的进攻。

（《连云港建设》二〇〇二年第六期）

云台山明代防倭烟墩

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先生在其所著《中国大历史》一书中说：“在十六世纪的中期，大明帝国的雍容安静气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其实，终明之世，倭寇始终是中国的一大忧患。

日本学者滕家礼之助在其《日中交流二千年》一书中就记录下了明朝创始人朱元璋对倭寇发出的嗟怨之声：“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君臣跌足语蛙鸣，肆志跳梁干天宪。今知一挥掌握中，异日倭奴必此变。”明太祖此诗反映了明朝建国之初的严重倭情。

海州地处中国脐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康熙海州志》说海州形势是：“东滨海，西接徐邳，北控齐鲁，南通江淮。沧海渺弥，茫无涯际。高丽、日本诸国遇东风扬帆可至。”海州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它是倭寇和海盗进犯的要冲，故而明朝当局在此布置了强大的海防力量，建立了巩固的海防设置。

据清初海州知州刘兆龙《东西守御二所并屯田纪略》一文载：“明洪武中，倭寇与海贼交讐，故于淮安卫八所内，分中所守御海东，中前所守御海西。东所有南、北二城，沿海十四墩，后增筑四墩，共十八墩。西所有州治、门禁、仓库，沿海十三墩，后增三墩，共十六墩，分军防守，既名守御，自非领运之卫所可比。”正因为明朝在海州设置了强大的海防力量，故明代海州地区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倭寇入侵，人民生命财产所受损失也较浙闽为轻。

烟墩在防倭战事中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从烟墩上的了望台可一视千里，随时巡监海面。遇有敌船驶来，守墩士兵迅即点燃烟

火,其他烟墩也随即点火燃烟。守营官兵见到烟柱冲天而起,立刻备战迎敌。烟墩的信息传递功能为防止倭寇入侵起到了积极作用。

海州地区的烟墩主要有平山、南固、朱五、北固、巨平、桅尖、在城、黑关、东陲、西陲、芦石、接递、石剑河、破王河、新坝、渎树浦、东墩等处。随着岁月长河不舍昼夜地流逝,海州的明代防倭烟墩到今天已寥寥无几,但有一处烟墩却完好地保存下来,这个烟墩就是巨平墩。他所在的菩山也因此而被称为烟墩山。

菩山称为烟墩山起源很早,据明末清初海州人赵一琴所修《续云台山志》载:“菩山俗呼为烟墩山。”清乾隆间崔应阶修的《云台山志》曰:“菩山在巨平村北,上有墩台。”

菩山(烟墩山),位于现在朝阳镇新墟公路北侧,远观菩山外形像一座金字塔,烟墩就坐落在金字塔塔尖的南侧。在那里有一块突兀而起的巨石,西、北、南三面皆为峭壁,只有东面人可攀援而上。此边基线长三一〇厘米。在此巨石上,覆盖着一块长方形大石,这就是烟墩之墩台。在西边的悬崖,墩台凌空而出,形成小石棚,形势十分险峻。

据我观察,此石有类似香炉一样的几只小腿,显系人工打制而成。这块大石不是天然形成覆盖在巨石上的,而是后来人力把它移上去的。此石南北长二六〇厘米,东西宽一三〇厘米,厚六六厘米。石头上面则由人工凿成一方小池,南北长九六厘米,东西宽五三厘米,深度三二厘米。小池用来盛放油料。在小池的西北角,有一道槽痕,可燃物浸泡在池油中,通过这道槽拖于烟墩外。遇有敌情,守墩士兵点着可燃物,烽烟便起。至今烟墩下方的石体上仍可见燃烧所留下来的黑色斑痕。由此可知,明代海防烟墩与汉唐时代西北边塞的烽火台所用燃料是不同的。这处烟墩是研究明代军事史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然而,巨平墩却面临着渐渐逼近的灭顶之灾。笔者在菩山看

见东边采石场人员繁忙,菩山之东已被劈去大半。我想,如果真有采石之炮轰平整座菩山的一天,人们要了解明代防倭烟墩之情况,也许只好来读我这篇小文了。但愿这一天不要来临。

(《连云港日报》一九九八年六月十九日)

晚明腐败的云梯关

云梯关位于响水县黄圩乡云梯村的废黄河北岸，明朝建立后，成为海防要地。洪武二年（一三六九年），在此设羊寨巡检司，二十六年（一三九三年），全国设内外卫三百二十九个，云梯关属大河卫。明世宗嘉靖时，倭寇渐起，三十四年（一五五五年），倭寇由淮河口经云梯关进入内地，明廷遂于云梯关屯兵筑城，在云梯关筑小城五座，关南、关西驻军设寨，称羊寨营、殿湖营，成犄角之势，起到了很好的防倭、抗倭作用。

云梯关的海防地位固然重要，但到明朝中晚期，已是腐败不堪。嘉靖四十三年（一五六四年）谪任海州同知权知州事的张峰对此很不满，在《隆庆海州志》中写道：“又有云梯关班役五十人，但轮月钱，皆无实用。分外需索且复多端。把总取之千户，千户取之部军。偶有警报，藉兵为民。武备虚弱至此，可胜叹哉！”云梯关所处战略地位非常重要，一旦出事，海州的后路将很容易地被抄，其正面防御将失去作用，后果不堪设想。云梯关的大兵只问钱财，不会打仗，遇有战事，借民为兵。由这样一班人来把守关口，忧患大焉，难怪张峰要愤愤不平地将此事写到《海州志》中！

（《连云港工运》二〇〇二年第十二期）